

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《彝文丛刻》（增订版）

任继愈

《彝文丛刻》由丁文江编辑，于1936年出版，约十余万字，是我国刊行的最丰富的彝文资料汇编。这部书出版后，引起国外学者广泛注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民族研究、民族调查普遍开展，国家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语文专家，不断发现新的资料，原先出版的《彝文丛刻》已不能适应新中国彝文研究新形势的需要。1982年由中央民族学院约请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彝文专家，发挥集体力量，在专家马学良先生主持下，编辑《彝文丛刻》增订版，资料由十万字增加到三十万字，还对初版误译处有所纠正，新发现资料有所增补，就原编辑中收集不当不全的资料予以掉换。为了标音准确，不用注音字母，采用国际音标。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上、中、下卷。增订版《彝文丛刻》比旧版更完善，为今后开展彝族文化研究提供可以信赖的资料，值得向读者介绍。

一

当人们初步把自己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时，便开始文化的创造。文化是人类自身创造的成果，这种创造不仅停留在制造工具、满足生活需要，因为鸟兽也会构筑巢穴。人的创造在简单生活需求之外，还要比鸟兽的制造更多一些文饰。制作衣服，除了在于遮体、御寒，还要增加一些华丽的装饰附加物，这种附加物

所费的工作量和所用的心思，甚至比原衣饰本身还要多。鸟类筑巢，兽类掘洞，从远古到现在没有多少发展。本能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差别就在此。有衣穿，进一步要求华美；有饭吃，进一步要求滋味；有房子住，进一步要求壮丽。文化生活所以能够被提到日程上来，只能在生活资料比较充足以后。这个极简单的道理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依据。

人类本来没有宗教，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有了宗教，动物就没有宗教。根据中国考古材料，人类的历史约有二百万年，产生宗教意识（不是系统的成型的）不过二万年。

宗教要解决的不是直接生产活动，它企图解决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疑难问题。天灾人祸，给人们带来苦难，苦难的原因来自外部，还是产生于自己？如果来自外部应当如何消解？如果来自内部，如何求得解脱？一般说来，苦难来自外部的观点是宗教意识的低级阶段，或称为原始宗教阶段；苦难来自内部的观点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，或称为系统宗教阶段。

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流行的许多宗教，基本属于原始宗教。彝族的《爨文丛刻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，也应归属原始宗教范畴。

原始宗教的特点是宗教活动与生产活动、文化娱乐活动混和不分。宗教活动中有集体娱乐，有欢庆丰收。殡葬死者，不单纯表示哀恸，也为后人祈福。

原始宗教既包含着迷信、崇拜，也反映着人类的追求和向往。对待有害于人类的神鬼，不光是希求它的恩赐，也有用强力使之不能为害的一些措施。

原始宗教包罗万象，涵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，所以这一部《丛刻》的内容值得深入剖析，系统研究。透过宗教的外衣，探求其中的十分丰富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信仰的内容。原始宗教包罗万象，不光彝族是这样，征诸世界各国无不如此。中国的古代文化形诸简牍的如《尚书》，保存在器物上的如甲骨卜辞，都

带有宗教色彩。看待历史，说明施政方针，以至建立城市、迁都、新政权代替旧政权，都离不开求神问卜。这种处处占卜，后来人看来，也许认为未免多此一举。这种行为，在当时人看来，是十分严肃的大事。因为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回顾前人走过来的道路，可以发现，这些方面正说明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。人们要求认识世界，改善生活环境，求得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结局，但外界事物在变化着，有些变化的结果可以预知，有的不能预知。在可知不可知之间，存在着某些偶然因素，这类偶然因素，重大的古人叫做“命运”，一般性的古人叫做机遇。命运和机遇都是一个未知数，但是人们又不甘心受未知数的摆布，要问一个究竟，这是人类不断深化认识，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。因此，神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。求神问卜与科学追求，就其性质说，是两种对立不相容的体系，这两种体系，都共存于同一个认识主体中（即人类）。《易》经本来是占卜之书，但占卜之书，却包含着探求世界之谜，掌握未来命运的合理企求。

《彙文丛刻》分为许多章节，各有侧重，但是总倾向及其思维方式则未逸出“人神之际”这个大的范围。其中有被除不祥的祈求，有追索世界起源的传闻，有指导生活的一些民族古训，有温习本族历史的回溯。它是彝族的“百科全书”，这部百科全书被宗教外衣笼罩着。只要透过笼罩着的宗教外衣作进一步探索，就会是有所收获，掘进得越深，收获也会越多。

二

中国人从事翻译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。大量翻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。翻译的主要著作是把佛经由外文翻为汉文，由汉文翻为外文的较少。唐、宋以后，有由汉文译为藏文的。唐朝也有把汉文译为梵文的，翻为契丹、西夏文字的。明清以后，有从汉文佛经翻为蒙、满、回等文字的。由于西欧与东方接触较多，也有传

教士把西方著作从欧洲文字（如拉丁、希腊）译成汉文的。

曾有千余年的翻译经验，究竟以什么方法最好，现在还没有定论。总之，不外两派意见，一派主张意译，翻大意，不必与原文的字句完全一一相当；一派主张直译，主张译文与原文的一字一句都要相当。这两派都有成功的经验，也都拥有一些追随者。直到今天，这两派都有自己的市场。翻译家严复的“信、达、雅”原则，似乎已被广大群众所接受。三者之中，“信”与“达”尤为重要。“雅”，属于修辞方面的问题，三者之中不得已去其一，只能保留“信”与“达”。这两条不能再减少了，因为信而不达，等于未翻；达而不信，等于新作。直译意译也不具有绝对的界限，有过翻译经验的人，都有这样的体会。

翻译少数民族文字的著作，为了保持信与达，还有另一层困难，有似当初魏晋南北朝时的译经情况。熟习原著文字的，不熟悉汉语；通晓汉语的，又不熟习原著文字。必须双方合作，互相补充，才能完成任务。而且语法习惯各异，一句话的叙述次序，汉语与西域方言及梵语也有所不同。古人翻译佛经，往往要有“缀文”这一道工序，先把梵文的句子中的词句照原文记下来，然后再按汉文的语法结构把它颠倒过来，服从汉文的表达方式。彝文翻译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。《彝文丛刻》的初刊，采用丁文江先生的办法，“四行译法”。先把彝文的读音用音标注出，再把与原文相当的汉字与彝文一一相当地摆出来，最后把每句的意思照汉语习惯标出来，这种办法称为“四行译法”（第一行是原文）。这种翻译的好处是科学性强，便于从中发现问题。问题发现后，也便于及时纠正。还有一种好处，是给后来翻译者以充分发展的余地。发现字形字音如有不妥或错误，也便于查找。这种“四行译法”已得到我国民族语言翻译者的认可，并用以翻译其它民族典籍。云南丽江，东巴文研究所翻译东巴经，也采用这个方法。即使目前译本质量没有达到要求，但这个成果可以给后来人提供可

信的依据，后人在这个基础上便于继续前进。

三

我国为多民族的国家，几千年来，民族之间不断融合，不断取长补短，才取得今天各民族共同前进、繁荣发展的局面。

汉民族在我国人数最多，是构成中华民族主要的组成部分。汉族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今天这个样子，它也是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诸多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。秦汉以后，中国内地各民族不断融合，以华夏民族为主体，把众多民族结合起来，形成汉族。晋、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有五胡十六国，南方也有许多山地边远地区的民族，经过三、四百年的融合，北方各民族逐渐形成北方文化的共同体，南方形成南方文化的共同体。南北朝后期，双方对峙的局面已不再是民族矛盾，而是南北双方两个封建政权的竞争。由于北方政权注重生产，政治管理胜过南方，最后由北方统一了南方。隋、唐两朝开国皇帝都不是纯汉族，都杂一半的北方少数民族血统。

从汉到唐，是中国文化、政治、经济十分发达的时代，达到了当时全世界高度发达的水平。这个现象反映了文化传播的规律。文化要发展、要传播是文化的本性，但传播发展，却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的。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。社会发展有快有迟，总的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，人类社会是由原始公社、奴隶制、封建制、资本主义制，最后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。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的不肯承认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循，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社会在进步，人类是由穴居野处，茹毛饮血的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，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的历程。

如果两种社会文化相接触，首先是引起冲突，接着是产生影响。一般情况下，总是先进的文化影响后进的文化，后进的文化

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。先进文化起主导作用，后进文化容易接受先进文化中的某些因素。文化因素，既包括生活中的饮食习惯，也包括意识形态和科技知识。如果接触的双方的文化水平相差很大，高层次的文化必将对低层次的文化大量灌输。如接触双方文化层次水平相当，不相上下，它们之间则是相互吸收的关系。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都表明这个文化传播现象是普遍存在的。

贵州、云南地区，与内地交往极多，汉唐文化影响到该地少数民族文化。显而易见的如以五行学说为宇宙框架结构，以五行配五脏、五色：

造人从肾造，人肾水属黑。壬与癸相依。水来将木润，人肝属木青，甲与乙相依。木上能生火，人心属火红，丙与丁相依。火来就生土，人脾属土黄，戊与己相依。金木水火土，人依世世重，五行顺乃福。

《丛刻》的《治国论》讲述了汉光武时代君臣论治国之道，“君乃民主首，民乃君百体”，这很象汉代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方法。《丛刻》还讲到“媒妁不作证，男女不成双”的婚嫁方式，可能只在社会上层贵族中的婚嫁方式，显然受了汉族的影响。

《丛刻》中保存的《宇宙生化总图》与道教流传的《太极图》很相似。《丛刻》保存了天干地支，《河图》的“五生十成”、《洛书》的“十生五成”。神的名称也与汉地流传相近，《离骚》有“吾令丰隆乘云”的说法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“季春三月，丰隆乃出”，彝族管云的神也称为“丰隆”，只是给加了姓，叫“张宏陇”。最明显的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的是彝文的《劝善经》，它译自汉文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全文约2.29万字，是彝文中最系统最完整的指导生活的准则。

宗教思想中，还有受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，命相合婚，婚礼歌中以鸿雁喻男女忠贞，与汉族婚礼奠雁有相通处。据十二生肖的生尅，推论婚姻、命运等等，显然受汉文化的影响。《丛刻》中

关于彝族来源传说及世家记载,《指路经》祝送亡灵沿着迁来时的道路,一站一站返回故乡,可以帮助了解彝族古代迁移的历史资料。

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统计,彝族人口为五百四十余万,现在估计应在六百万以上,这样广大人口分布在西南数省,又有自己文字的兄弟民族,对他们文化遗产的整理、研究,不但对彝族文化是必要的,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史,也有重要意义。

中华民族的历史,是由众多兄弟民族之间互相促进、互相借鉴的长期过程的纪录。目前的现状是汉族占多数,其它兄弟民族是少数。不论多数还是少数,它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对中华民族做出贡献。就其贡献的意义和作用而论,都是平等的。今后还要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目标下共同前进。研究彝族文化也是祖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希望在现有的条件已打下的基础上,继续提高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图书馆

本刊第三届编委会成立

〔本刊讯〕本刊上届编辑委员会任期已逾,1990年2月调整成立新的编委会。由伍跃、权儒学、杨讷、李凭、李致忠、陈翔华、周迅同志(以姓氏笔划为序)组成第三届编委会,陈翔华同志任主编。本届编委会任期自1990年2月至1991年2月。